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民国时期西部边疆  
的  
政权建设与族群关系



管志翔

马戎 主编

ADMINISTRATIVE CONSTRUCTION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WESTERN FRONTIERS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丛书主编 / 马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民国时期西部边疆 政权建设与族群关系



本研究另辟蹊径，以民国历史为考察的入手点，重点关注宏观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变迁与其中微观层面的群体或个人行动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索历史事件与历史趋势的社会学意义。因此可以说，本文集是有关民国时期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史研究的汇编，其中蕴含着社会学研究者以史为鉴的现实关怀。

上架建议：社会学

ISBN 978-7-5097-7367-3



9 787509 773673 >

ISBN 978-7-5097-7367-3

定价：59.00元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21  
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民国时期西部边疆  
的  
政权建设与族群关系

丛书主编 / 马戎

管志翔

马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西部边疆的政权建设与族群关系/菅志翔, 马戎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0

(21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ISBN 978-7-5097-7367-3

I. ①民… II. ①菅… ②马… III. ①边疆地区-地方政府-建设-研究-西北地区-民国 ②边疆地区-地方政府-建设-研究-西南地区-民国 ③边疆地区-民族关系-研究-西北地区-民国 ④边疆地区-民族关系-研究-西南地区-民国  
IV. ①D693.62 ②D693.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9780号

· 21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

## 民国时期西部边疆的政权建设与族群关系

---

主 编 / 菅志翔 马 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童根兴

责任编辑 / 杨桂凤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010)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25千字


版 次 /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367-3

定 价 / 59.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政权建设与族群关系（导言） …………… 马 戎 / 1

试论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演变

——兼论民国时期西北回民社会精英的

宗教策略 …………… 管志翔 马 戎 / 38

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精英：理解中国从“天下帝国”到“民族国家”

进程的钥匙 …………… 马 戎 / 58

满族民族性：帝国时代的政治化结构与后帝国时代的去政治化

结构 …………… 关 凯 / 68

“寻找国家”

——清末民国时期蒙古族精英国家认同的演变与形成 …… 常 宝 / 86

马麒的身份转换与政治抉择

——兼议民国时期地方割据势力的国家意识 …………… 管志翔 / 108

青海民国史研究的进入

——兼评李文实先生的文章《马氏家族长期统治青海的

原因试测》 …………… 管志翔 / 132

## 2 民国时期西部边疆的政权建设与族群关系

---

流官进入边疆：清初以降川边康区的行政体制建设 …………… 王 娟 / 156

边疆自治运动中缺失的“族性”

——以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三次“康人治康”

事件为中心 …………… 王 娟 / 178

喇嘛庙：敌人还是伙伴？

——清初以降甘孜藏区的政教之争 …………… 王 娟 / 196

# 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政权建设与族群关系\*

## (导言)

马戎\*\*

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堪称是中国历史中最复杂和最动荡的时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便陷入一个在东西方列强不断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割地赔款、极尽屈辱的恶性循环之中。几千年来以自我为中心、俯视“蛮夷”的中华文明被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与其他文明相遇只懂“丛林法则”并且“船坚炮利”的西方文明体系无情攻击，显得不堪一击。李鸿章惊叹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战争赔款为例，鸦片战争赔款2100万银元；甲午战争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接近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三倍；八国联军签订的《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以当时中国国民总数4.5亿人计算，每人罚银一两以示惩戒，因清政府无法一次缴纳，便以关税、盐税等担保，39年还清，本利共计九亿八千多万两白银，另有各省地方赔款两千多万两白银（《中国近代史》编写组，1979：28、245、343）。天文数字的巨额战争赔款不仅使清政府国库罄尽，也使民间积累的财富在朝廷苛捐杂税和外国强盗军队抢劫的双重掠夺中消耗殆尽。同时，中国

---

\* 本文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 作者为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族群社会学、人口社会学、边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人口迁移与城市化。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传统中华文明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文化与伦理秩序分崩离析的过程，是中华民族被迫探索新的生存之道的过程。

1840年至1911年间，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侵略战争疯狂割占中国领土，如香港、澳门、台湾、库页岛、黑龙江北岸、乌苏里江东岸、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大片国土通过战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先后被割让。与此同时，列强在各通商城市遍设“租界”，派驻陆海军和巡捕警察，实施领事裁判权制度，强占各地铁路修建经营权、矿产开采权，外国教堂密布全国城乡，洋人“探险家”、传教士和商人深入边疆地区各个角落。列强在控制中国海关后大幅降低关税，使“洋货”充斥各地市场，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经济体系和贸易网络，导致城乡居民的生计残破凋零。对帝国主义者来说，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冒险家乐园”；但是在中国人的眼里，这片国土已成为风雨飘摇、毫无尊严的伤心之地。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写道：“上海有个外国公园。门首贴一张字道：‘狗和华人不准入内’。中国人比狗还要次一等哩！”（陈天华，2002/1903：71）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感叹：“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危同累卵。……感激时事，耿耿不能下脐。”（郑观应，1894：11~12）谭嗣同在诗中叹息：“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中国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环境下爆发“辛亥革命”，终结了清朝的国运。其实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就已经处在一系列内外矛盾的激烈冲突之中，清朝的统治已呈摇摇欲坠之态。武昌起义揭开了一个蕴蓄已久的“潘多拉盒子”，各种矛盾随即以空前的强度和错综复杂的形态迸发出来。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些形形色色的矛盾才终于被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压制和掌控，使中国大陆国土重新获得了统一，并使这个古老的国家得以在全新的意识形态和全新的社会制度下继续前行。

那么，我们今天应当如何来看待和理解中华民国的这段历史？

### 一 贯穿中华民国38年历史的三条主线

贯穿中华民国38年历史的可以说有三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第二条主线是中华民国下属各民族维护国



家统一、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分裂势力的斗争。这两条主线是晚清“救亡图存”斗争的延续。第三条主线是积极探索如何实现国家体制的政治转型，实现从一个“多元型帝国”向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过渡和国民思想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外部思想和势力的介入具有双重性的影响：既向中国人介绍了现代“民族主义”理念和共和制国家形态，同时又以这些理念鼓励中国各群体“独立”与分裂国家，试图瓦解中国并使其变为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

辛亥革命后，这三条主线彼此交织在一起，新生的民国既要抵御外敌反对分裂，又要推动民主宪政，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sup>①</sup>在国家体制转型的这条主线上，我们看到了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议会选举与议政实践（内森，1994/1983；王建朗，2008），也看到了江西苏区试行的苏维埃制度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代表制度（李云峰，1986），但是这些政权建设的进程往往被接连不断的国内外战争中断。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所关注的主要是前两条主线，即中国各族人民在民国期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国内分裂势力的斗争。

### 1. 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在民国期间，侵略中国的外国势力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一个侵略的方向来自北方的沙皇俄国和它的继承者苏联。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沙俄军队强占隶属外蒙古行政区的乌梁海地区（15万平方公里），驱除清朝驻守官吏，1914年强行移民12000人。十月革命后，1920年苏联红军占领乌梁海地区。1915年，北洋政府、沙俄政府、外蒙古代表共同签订正式协约，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1920年，沙俄残军被红军击溃后，进入外蒙古。1922年红军占领外蒙古全境。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并与苏联正式结盟。同年苏联把乌梁海地区从“蒙古国”划出，并入苏联，建立“图瓦人民共和国”。但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图瓦人民共和国”都不予承认。

<sup>①</sup> 在外敌环伺、危机四伏的年代，民主体制未必是一种维护国家统一的最有效的体制。这也是为什么章太炎在1912年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后，建议多给袁世凯一些权力，“此存亡危机之顷，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由袁“暂以便宜行事”，可全力解决边疆地区的危机（马勇，2008：1569）。

1945年8月,中华民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下简称《条约》),《条约》第一条即要求在外蒙古举行公投,中国政府将承认公投结果。1945年10月10~20日外蒙古举行公投,无人反对独立。1946年1月中华民国外交部宣布承认外蒙古独立。外蒙古从此不再是属于中国的领土。

盛世才在新疆执政11年(1933~1944年),他作为苏联共产党党员一度与苏联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张大军,1980:6383),在他执政期间,苏联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势力渗透到新疆各地,许多地区有苏联驻军,苏联垄断了阿尔泰地区的矿藏。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盛世才在新疆开展了“民族识别”,识别出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14个“民族”<sup>①</sup>,这与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是背道而驰的。1942年苏联抵抗德军的战争处于最艰苦时期,盛世才误判形势进行政治投机,公开反苏反共。1944年9月,在苏联策划组织和苏军直接参与下,北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地区发生武装暴动,打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以下简称“东突”)的星月旗,制造民族仇杀,公开分裂祖国。1945年8月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为了使民国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苏联推动“东突”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签订和平条款。<sup>②</sup>在张治中的坚持下,“东突”改称“三区”,与新疆省的其他七个行政区于1946年6月成立联合省政府。这样,新疆才没有成为第二个外蒙古。

另一个侵略的方向来自东方的日本。这个急于“脱亚入欧”以加入西方列强侵占殖民地浪潮的新生军国主义国家,在明治维新后不久即提出“征韩论”作为称霸亚洲并征服世界的侵略蓝图。<sup>③</sup>日本右翼的“黑龙会”

① 1935年新疆召开第二次民众代表大会,确定了新疆有14个民族。1949年后,新中国基本接受了盛世才“民族识别”的结果,仅做了两个调整:一是将原来以流亡白俄为主的“归化族”改称“俄罗斯族”;二是认为北疆的“塔兰其族”应归并到南疆的“维吾尔族”(李晓霞,2009:17)。

② 有学者认为苏联之所以推动“东突”与民国政府谈判,一个重要的考虑是担心引发苏联中亚各国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运动,威胁苏联的统一(薛衔天,2008)。

③ 梁启超很早就看出日本对外侵略的主要对象是中国:“试问今日茫茫大地,何处有可容日本人行其帝国主义之余地,非行之于中国而谁行之。”他提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梁启超,1989/1902a:26、35)

明确把侵占中国东北作为战略目标。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后，不仅攫取了台湾、朝鲜半岛、琉球这些富饶的土地和资源，而且从清朝获得了两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由于在俄、美压力下“吐出”清朝被迫割让的辽东半岛，日本又额外从中国获得三千万两白银的赔款。这些“战争赃物”使日本从灵魂到骨子里变成了一部极其贪婪和疯狂残忍的侵略机器。

随后日本便开始制订并逐步实施“征服满洲，征服中国”的侵略计划，日本间谍遍布中国全境，勘探矿藏，绘制地图，交结军政要人，调查各地语言宗教民俗（解学诗，2008），终于在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全境，利用清朝退位皇帝溥仪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但是日本人的胃口要大得多，在占领热河进入河北后，又在1937年发动七七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日军凭靠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和武士道精神，训练出一支高效和疯狂的军队，不仅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还狂妄地进攻东南亚，偷袭珍珠港，正面向英国和美国发动太平洋战争。最后日本在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打击下宣布无条件投降，退出了台湾、朝鲜半岛、库页岛和南千岛群岛，中国得以收回在甲午战败后被迫割让的传统领土台湾与澎湖列岛。

这两股侵略势力，一个来自西北，另一个来自东方，都对中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造成巨大威胁和无法挽回的永久性伤痛。与此同时，民国时期其他国家如英国和法国也通过胁迫民国政府在中印边界、中缅边界、中越陆地与领海边界方面不断侵害中国主权，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也为这些国家在获得独立后就领土领海与中国发生争议埋下隐患。

## 2. 中华各族维护国家统一，与国内分裂势力进行斗争

第二条主线，是中华民国下属的各民族维护国家统一、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分裂势力进行斗争。

由满洲贵族建立的清朝，以进关时的60多万人来统治明朝管辖下的6000多万人口深感实力不足。因此，为了把其管辖下那些讲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并有不同生活习俗的群体分而治之，清朝在行政设置上采取的是“多元型帝国构造或多元型天下体制”（王柯，2014：176），在汉人居住区通过省府县体制实行直接统治，在东北和伊犁设立满洲将军辖区，其他大多属于间接统治，如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采用世袭土司制度，在蒙古

部落地区实行世袭札萨克王爷和盟旗制度，在南疆绿洲采用伯克制度，禁止各部分居民之间进行横向交流和人口迁移。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当地群体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免受中原地区的冲击以防造成剧烈的社会动荡，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各部分联合起来威胁清朝的统治。王柯教授以新疆的维吾尔社会为例指出，“将维吾尔社会与汉人社会完全隔离起来，其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维吾尔人的利益不受汉人的侵害，而是为了阻止维吾尔人与汉人进行交流和吸收中华文化。然而，这一具有狭隘民族意识的统治政策，妨碍了维吾尔人形成中国国家意识和中国人意识，它不仅给清王朝的新疆统治留下破绽，也是给王朝时代以后的近代中国社会留下的民族问题的病灶”（王柯，2014：175～176）。

这样的多元化统治体制，造成各族群聚居区之间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行政区划与制度区隔，也保持甚至强化了各民族聚居区之间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区隔和不同语言宗教、社会习俗的文化区隔。这就为帝国主义通过向中国各族群灌输和培植“民族”意识来分化瓦解中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为中华民国和后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清朝基础上创建共和体制和建设现代公民国家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在中华民国38年的历史中，在外蒙古、内蒙古、东北（满洲）、新疆、西藏等地先后出现了不同范围、不同程度的民族分裂运动，而在所有这些分裂活动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无一例外地都有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推动和鼓励。

## 二 帝国主义别有用心地向中国 各族群输入“民族”意识

帝国主义在对外殖民扩张和划分全球势力范围的过程中，早就看中中国这片肥沃辽阔的土地和四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但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在历次侵略战争中也发现，尽管清朝军队武器装备十分落后，清朝官场非常腐朽，但是清政府在下辖的许多族群当中仍然保有一定的权威，各族军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外国侵略军。

自鸦片战争后，中华各族在清廷统一指挥下积极参与了抵御列强侵略的战争。如1841年桂、贵、鄂等省各族士兵参加广东抗英战争，四川松

潘、建昌、大金的藏、羌、彝士兵支援江浙前线<sup>①</sup>；1860年数万蒙古骑兵顽强阻击进军北京的英法联军；1885年壮、瑶、白、彝各族士兵参加了中法战争镇南关战役；1894年甲午战争，来自陕甘的回族将士在平壤保卫战中英勇抗击日军（《中国近代史》编写组，1979：23、95、216、233）。中国各族军民的顽强抵抗使帝国主义侵略者受到重大损失，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认识到，面对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如果不能成功地把中国瓦解成几个部分并挑起内斗，只靠列强人数有限的远征军无法征服这个庞大的文明古国。

此后，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最重要的策略，就是极力分化瓦解中国这个“多元帝国”，使其无法凝聚力量来有效对抗帝国主义的土地侵占、资源掠夺和市场倾销。

### 1. 帝国主义列强分化瓦解中国的步骤

第一步，它们以中国各地不同群体在族源、语言、宗教、习俗、传统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差异作为“民族识别”的素材和依据，把汉、满、蒙、回、藏等都称为“民族”（nation），作为一个分化瓦解中国的总体框架。晚清时期从日文汉字直接译成汉文的“汉民族”、“蒙古民族”、“满洲民族”、“藏民族”等提法也由中国留日学生在介绍国际政治和西方文化理念时“囫圇吞枣”地引入中国。<sup>②</sup> 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之后“汉民族”、“蒙古民族”、“满洲民族”、“藏民族”等提法充斥当时的学校教科书和报刊出版物，正是这些提法造成国人在认识和使用“民族”一词的概念与认识混乱，贻害至今。

<sup>①</sup> 1842年2月，2000名藏族官兵在瓦寺土司守备哈克里、大金川土司千总阿木穰带领下抵达浙江，哈克里和阿木穰及许多藏族战士在与英军交战中英勇牺牲，当地百姓建“交节祠”以志纪念（王宇，2009）。

<sup>②</sup> 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些概念有可能危害各族对中华国家的认同，1903年梁启超先生即提出应区分开“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梁启超，1989/1903：75~76）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的观念：“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梁启超，1989/1902b：21）关于“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与传播，参见黄兴涛，2002。

第二步，各国公使馆、洋人开办学校的课堂，洋人主办的报刊和出版物极力向中华各族精英人物介绍西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one nation, one state）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观念，向中国各族精英宣讲“民族独立”是世界时代潮流，通过各类学术著作和新闻媒体宣传推动中华各族构建“汉民族”、“满洲民族”、“蒙古民族”、“西藏民族”等群体的“民族意识”和“独立历史”，极力进行挑拨离间，激发各族之间的不信任和历史仇恨。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文化传播”和“学术交流”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煽动中华各族通过“驱除异族”（尤其是汉族的排满运动）来“独立建国”。

第三步，为了实质性地推动各“民族”的独立运动，各国均设立各类基金和许多专款项目吸引与资助汉、满、蒙、回、藏等各族青年赴俄、日、英、法和英属印度等国留学，努力培养一大批具有独立民族意识和政治理念的“民族”精英队伍<sup>①</sup>，作为各地区反清独立运动的领导者和中坚力量。

第四步，由政府或民间人士出面，积极联络、组织、资助和指导汉人的“排满”运动以颠覆清王朝。清朝末年的汉人反满组织，大多都有日本支持的背景或以日本为组织总部所在地，如孙中山建立的“兴中会”、“同盟会”等。<sup>②</sup>“兴中会”入会誓词中广为人知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是日本右翼黑龙会下属玄阳社向孙中山建议的。日本甚至造出“中国本部”这一概念<sup>③</sup>，为其分裂中国边疆地区埋下伏笔。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为威海登陆日军起草的汉文安民告示《开诚忠

① 1939年赴拉萨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仪式的蒙藏委员会主任吴忠信在《西藏纪要》一书中曾罗列23名留学英国或英属印度的藏族青年名单（吴忠信，1953：92~94）。其他如留日满人金璧辉（日名川岛芳子）等，都在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活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② 孙中山1894年10月第一次来到日本，1894年11月在夏威夷与日本人菅原博相见，并通过菅原博认识曾根俊虎、小林樟等。1894年11月24日，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的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1897年日本众议员犬养毅对平冈浩太郎（长期在华搜集情报的日本“玄阳社”头子）说：“愿吾兄将彼等（孙中山等人）握住，以备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时可用。彼等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陈锡祺，1991：156）

③ 顾颉刚先生认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就是从日本的地理教科书里抄来的……自从明治天皇定下政策，打算征服中国必先攫夺满蒙，便硬造出‘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析出边疆于本部之外”（顾颉刚，1939a）。

告十八省之豪杰》中公开鼓吹“贵国民族（汉族）”应以“十八行省建立中华国家”，“逐满清氏于境外”。<sup>①</sup>这就是16年后辛亥革命最初打出“十八星旗”的源头。

第五步，当清政府在列强侵略和汉人革命党“排满”运动冲击下日渐衰弱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得的各种领事权和经贸、传教特权直接深入中国各边疆地区，他们与地方首领建立联系，以“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为幌子公开或暗地里鼓动这些族群脱离中国。列强向一些具有分裂倾向的地方首领提供资金、顾问和军械，直接鼓励他们通过“民族自决”建立“自治政府”，承诺为独立运动提供财政和外交支持，条件是独立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作为支持独立的“回报”，将获得更多的特权和利益。<sup>②</sup>我们在外蒙古、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的独立活动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列强的直接介入与公开支持。面对列强的煽动蛊惑，一些头脑清醒的少数民族首领公开反对这种分离倾向，坚决维护国家统一。<sup>③</sup>

## 2. 清政府的应对

面对这一严峻局势，晚清政府只能被迫改变原来“多元型帝国”的统治结构，采用多种措施来加强各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整合，以防止边疆领土的进一步丧失与国家分裂。如：为了化解汉人的“排满”运动<sup>④</sup>，清廷大力提倡“化除满汉畛域”<sup>⑤</sup>；取消东北移民限制并组建府厅州县；在内蒙古各地设垦务局组织“放垦”移民并设立府厅州县（余元龢，1958；常安，2010：10；赛航等，2007：37~39）；赵尔丰在

① 摘自《日清战争实记》，<http://mil.news.sina.com.cn/2004-09-17/2210228138.html>。

② 1911年11月，沙皇政府指示驻华公使努力“把中国分为几个独立国家，在我们看来，是与我们广泛的利益一致的”（《中国近代史》编写组，1979：453）。

③ 1911年9月，针对报刊传闻“四省土司同胞，将联合乞保护于法国，以抗清廷改土归流之政策”，贵州南龙桥彝族土司安健在《民立报》上发表《劝滇蜀桂黔诸土司文》，警告他们这是“将先代数千年之禋祀、子孙无穷之富贵孤注一掷，不忍小忿而陷大恶，速全国崩离析之祸”（秦亮，2009）。

④ 当时汉人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排满”的汉民族主义。章太炎的《排满歌》，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鼓吹“反满”、“排满”在当年流传极广（王春霞，2005：142）。

⑤ 如考察海外宪政五大臣之一镇国公载泽提出“方今列强逼迫，合中国全体之力，尚不足以御之，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暂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称“此后无论满汉统称国民，有仍分满汉者按律科罪”。（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1979：948）

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联豫和张荫棠在西藏施行“新政”，新疆1884年正式建立行省，1907年在东北设立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行省：晚清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逐步推进全国统一的行政建制和管理体系，把清朝入关后长期采用“多元式”管理体制的边疆地区逐步整合进一个统一政制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

同时，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湘军、淮军等汉人武装集团虽有能力和改朝换代却始终效忠清朝，这也使清廷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对汉人的疑虑，并在所谓“同治中兴”之后不得不倚重汉人官僚和军队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积极吸收汉人和边疆各族精英人物进入中央与地方政权，<sup>①</sup>取消或调整各级政府机构中“汉缺”、“满缺”、“蒙缺”等带有族群背景的职业限定。这对晚清的满汉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国际干预形势和国内族群矛盾激化的态势下，在清末各族知识分子当中出现了应当坚持排满和建立“汉人国家”还是维护五族共和、建立“中华国族”的大辩论，出现了关于君主立宪与共和体制的大辩论（王柯，2001：189～194；王春霞，2005：146～216）。这些有关“民族”、“国民”、“国族”和国家体制的大讨论为清帝退位后建立的新国家奠定了政治认同的基础。

### 三 民国政府如何应对民族分裂势力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后，其影响迅速遍及全国，数月之内“光复十七省”。1911年底，各省代表齐聚南京，共同推选孙中山为民国临时大总统，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

#### 1. 放弃“十八行省建中华”，主张“五族共和”

随着清朝颁布《退位诏书》，这个风雨飘摇、内外矛盾重重的“多元型帝国”面临即刻崩溃的危险。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在沙俄驻库伦（今乌兰巴托）领事直接参与下，召开由18位王公喇嘛参加的秘密会议，策划

<sup>①</sup> 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以湘军、淮军为首的汉人官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在清政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八国联军侵略中“护驾”有功的陕甘回回首领（马海晏、马麒父子等）得到朝廷的重用，为民国时期甘青宁马家军阀的统治打下基础。



“外蒙古独立”。沙俄随即表示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同意给予军事援助，蒙古6盟49旗中有35旗王公响应或支持库伦“独立”。1912年1月俄蒙军队占领呼伦贝尔并成立隶属库伦的“自治政府”。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支持下宣布“驱汉”。<sup>①</sup>1913年10月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和西藏代表提出内容基本相同的“西藏”边界草案，并秘密划定“麦克马洪线”作为西藏和英属印度的边界，留下边界争议的后患。1913年7月沙俄指使外蒙古军队进犯新疆阿尔泰地区（李国栋，2009：19~27）。

边疆地区空前严峻的形势和国家分裂的危机直接摆在辛亥革命领袖、北洋军阀首领和全国各族人民与各界人士面前。是主张“分”，还是主张“合”？如果主张“分”，是否以十八省为新“中国”的疆域？那么，十八省内的几百万满、回、苗、夷、番等“非汉人”的各族民众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是否要依照邹容在《革命军》中所说“驱逐住居中国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邹容，1903/2002：55、7）？这会在全国各地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sup>②</sup>而那些居住在十八省范围之外的几百万汉人，又将是什么命运？是在当地的冲突中被杀，还是全体迁入十八省境内？1912年内蒙古境内有116万汉族人口，蒙古族人口为87万（吴明，1982：16~17），如果在内蒙古各地出现蒙汉冲突和“驱汉运动”，将会是怎样一个血腥的局面？我们查不到清末新疆各族群人口的数字，但是据记载仅1902~1935年间迁入新疆的汉人即不下20万（周崇经，1990：57）。那么，一旦在新疆出现“排汉”运动，加之宗教因素，是否将会是一次更加惨烈的种族清洗？

① “国内外以前都提1913年1月达赖喇嘛宣布‘独立’事，但据有学者最新研究，严格说来，并不存在此事。达赖喇嘛发布的例行的《新年公告》，其实并未正式提到‘独立’问题。声称西藏和蒙古为两个‘独立国家’的所谓《蒙藏协定》，不过是俄国间谍德尔智擅自代表西藏所为，它不仅没有得到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承认，连热心此事的俄国和英国也不予承认，甚至十三世达赖本人也予否认。见喜饶尼玛《近代藏事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86~87页”（转引自黄兴涛，2002）。

② 辛亥革命后以民国军统帅黎元洪名义发布的《中华民国军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中公开号召与满、蒙、回、藏四大族为敌。武昌起义后“三天来被杀旗人不下四五百名，横尸遍地”，“一旗人怀抱着一个约数月婴儿在街头被杀”，“汉口的市民听说武昌开来了军队，不约而同地大放鞭炮，夹道欢迎，无数群众高呼‘杀尽胡儿’、‘兴汉灭满’的口号”（王春霞，2005：228、230~231）。